

美国霸权想象下的中国“大战略”

——《持久战：中国取代美国秩序的大战略》评介^①

周文星

[内容提要]拜登总统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杜如松的新著《持久战：中国取代美国秩序的大战略》引发美国内外各界广泛关注。该书基于美国霸权想象构建中国“大战略”，声称中国自冷战结束以来在军事、政治和经济层面采取钝化、建制与全球扩张战略，以便实现所谓取代美国霸权秩序的长期目标。从美国政府尤其是拜登行政当局对华政策的动向来看，该书已成为美国两党政治精英制定对华政策的重要“指南”。评述该书的弊端与不足，不仅有利于理解当下美国对华政策的错误之根源，而且有助于把握和研判未来较长时间内美国对华政策的大致走向。

关键词：美国军事与外交 中美关系 美国霸权 中国“大战略”

随着中美关系近年来发生实质性的重大变化，有关中美战略竞争与美国对华政策的文献不断涌现。在这其中，由牛津大学出版社于2021年7月出版的《持久战：中国取代美国秩序的大战略》（下文简称《持久战》）一书，^②引起了美国国内外的

① 感谢《美国研究》匿名评审专家为本文提出的修改建议。文中如有任何疏漏，概由笔者负责。本文为202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项目编号：21CGJ047）和2021年江苏省“双创博士”资助项目（项目编号：JSS-CBS2021004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② Rush Doshi, *The Long Game: China's Grand Strategy to Displace American Order*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1). 该书是杜如松基于其2019年向哈佛大学文理研究生院提交的博士学位论文修订而成，参见 Rushabh Doshi, *The Long Game: Chinese Grand Strategy after the Cold War* (Doctoral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Graduate School of Arts & Sciences, 2019), available at: <https://dash.harvard.edu/handle/1/41121327>.

广泛关注与热烈讨论。该书作者杜如松(Rush Doshi)现任拜登总统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在书中声称中国正持续推进一项旨在取代美国霸权秩序的大战略。他的这一观点与美国国防部顾问、保守派智库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高级研究员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在2015年出版的《百年马拉松: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的秘密战略》(*The Hundred-Year Marathon: China's Secret Strategy to Replace America as the Global Superpower*,下文简称《百年马拉松》)一书中表达的核心观点颇为相似。^①但是,与白邦瑞一书在美国国内遭受不少质疑有所不同的是,《持久战》赢得了美国战略界、学术界、媒体界多数人士的肯定。^②如果说,《百年马拉松》的出版标志着美国战略界公开掀起所谓中国试图取代美国霸权地位的政策辩论,那么《持久战》的问世则意味着美国战略界近年来激烈的对华政策辩论似乎已步入尾声。用小布什总统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任、现任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副总裁迈克尔·格林(Michael J. Green)的话来说,《持久战》表明“关于中国是否有一项取代美国亚洲领导权的战略的辩论已经结束”。^③那么,中国真的拥有《持久战》所声称的“大战略”吗?该书是如何得出这一论点的?更重要的是,它对美国战略界、中美关系乃至国际秩序造成何种影响?本文尝试回答这些问题。

一 《持久战》中的“中国大战略”

“中国大战略”是贯穿《持久战》全书的关键词。在作者杜如松看来,“大战略”(grand strategy)是关于一个国家如何实现其战略目标的理论,该战略目标是蓄意的,需要协调并通过军事、经济和政治等多种治国方略加以实施。^④它之所以“宏大”,不仅在于其战略目标的规模大,而且在于协调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多。由于大多数大国并不具备协调实现此类战略目标的手段,所以绝大多数国家并没有大战略。作者认为,论证某个国家拥有“大战略”与否的关键,在于辨识该国是否存在“大战略”的概念、具备实现“大战略”的能力,以及表现出试图推进“大战略”的相关行为。^⑤

① Michael Pillsbury, *The Hundred-Year Marathon: China's Secret Strategy to Replace America as the Global Superpower* (New York, N.Y.: St. Martin's Griffin, 2015).

② “The Long Game: Reviews and Awards,” available at: <https://global.oup.com/academic/product/the-long-game-9780197527917?cc=us&lang=en&#>. 本文的“战略界”主要指涉政界和政策研究界,后者又以以各类战略与政策研究为导向的智库为主,也包括少量研究外交战略与政策议题的高校学者群体。

③ Rush Doshi, *The Long Game: China's Grand Strategy to Displace American Order*, p.ii.

④ Rush Doshi, *The Long Game: China's Grand Strategy to Displace American Order*, p.6.

⑤ Rush Doshi, *The Long Game: China's Grand Strategy to Displace American Order*, pp.10, 16~19.

之所以要研究并关注“大战略”，主要因为崛起国的“大战略”可以重塑历史，进而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作者警告称，中国的军事、经济与政治实力雄厚，如果误判其“大战略”，美国倡导的自由价值观将“岌岌可危”。因此，《持久战》围绕中国有无“大战略”、中国如何实现其“大战略”、美国如何应对中国的“大战略”这三个核心问题，依次展开分析。

首先，《持久战》通过分析中国的“大战略”概念、实施能力及行为，判断中国有无“大战略”。作者认为，“大战略”概念事关如何匹配战略的目的、方式和手段，只有挖掘和分析中国官方的权威性文件与文本——包括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书店出售的图书，各大图书馆收藏的全数字化中文文献，以及中国电子商务网站上的资源，等等——才能找到中国的“大战略”概念。在作者看来，这些文本不仅提供了中国关于“大战略”概念的洞见，而且通过分析相关机构的运作方式评估了中国实现其“大战略”的能力，并通过展示某些决策形成的动因考察了中国实施其“大战略”的行为。^①作者还聚焦于回忆录、选集、简编等反映中国战略意图的文本，研究和评估中国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相关机构（如中共中央总书记办公室、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中共中央各类领导小组、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大战略”实施能力。作者分析后认为，中国共产党既是一个民族主义政党，也是一个列宁主义政党，这是中国制定和实现其“大战略”的关键因素。该党的民族主义倾向有利于它制定中国“大战略”的目标，列宁主义倾向则有助于提供实现这一目标的必备工具。^②此外，《持久战》多次强调，要明确中国的“大战略”行为，必须运用作者所谓的社会科学途径去分析中国的国家行为。作者从“大战略”的概念、实施能力和实施行为等三个指标展开分析，并借鉴霸权秩序研究“第三波”（third wave）^③的概念，提出了《持久战》的核心观点：中美竞争始于冷战时期，冷战的结束直接促使中国制定了一项“大战略”，即致力于在不与美国发生战争的情况下与后者展开“秩序之争”（contest for order），最终取代美国的霸权国地位。^④换言之，作者从权威文本、决策机构和外交行为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后，判定中国制定了致力于取代美国霸权的“大战略”。

其次，《持久战》分析了中国如何实现作者所谓的“大战略”，这是该书的核心内容。作者首先援引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家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等人有关

① Rush Doshi, *The Long Game: China's Grand Strategy to Displace American Order*, p.17.

② Rush Doshi, *The Long Game: China's Grand Strategy to Displace American Order*, pp.25~40.

③ G. John Ikenberry and Daniel H. Nexon, "Hegemony Studies 3.0: The Dynamics of Hegemonic Orders," *Security Studies*, Vol. 28, No.3 (2019), pp.395~421.

④ Rush Doshi, *The Long Game: China's Grand Strategy to Displace American Order*, pp.3, 19, 299~300.

主导地位国支配次要地位国的“控制形式”(forms of control)^①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美国用于规范其他国家的行为,进而维持其在地区和全球秩序中的地位的三种“控制形式”与能力,即强迫他国服从的胁迫能力(coercive capability)、激励他国的共识诱导(consensual inducements)和正当地命令他国的合法性(legitimacy)。三者共同确保了所有国家对既有秩序的服从。其中,胁迫能力源于美国的军事实力及其在国际体系中威胁、惩罚他国的结构性权力,涉及货币、贸易和核心科学技术等;共识诱导指涉通过互惠谈判或诱惑来实现激励甚至“贿赂”合作的能力(如提供安全保障与公私物品);合法性则基于美国利用其国家身份或意识形态发出命令的能力。^②但是,鉴于核武器对大国战争的抑制作用,作者表示担忧并警告称:和平时期的大国竞争,意味着崛起国可能在不费一枪一炮的情况下推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主导建立的国际秩序的转型。作者随后回顾了近现代史上主要崛起国与霸权国的互动机制,将崛起国对其与霸权国实力差距的大小感知和霸权国对其威胁的强弱感知视为两个关键自变量,分别用于衡量霸权国损害崛起国利益的能力和意愿,构建崛起国对待霸权国的四大战略。

具体而言,当崛起国认为霸权国比自己更强大且具有较强的威胁时,崛起国将采取旨在钝化或削弱霸权国的控制力与影响力的战略;当崛起国认为霸权国比自己更强大但不具有较强的威胁时,崛起国往往会选择忍受甚至支持霸权国秩序的顺应(accommodate)战略;当崛起国认为霸权国只是略微强大但具有较强威胁时,崛起国将建立自己的制度以控制他国;当崛起国认为霸权国只是略微强大且不具有较强威胁时,崛起国将更有可能追求对霸权秩序中其他国家的支配战略。作者认为,相对于美国更多地依赖于共识诱导与合法性两种能力来维持既有秩序,中国更倾向于运用包含胁迫和共识诱导两种能力在内的建制战略和钝化战略,以和平方式取代既有秩序。作者将上述两种战略称为“取代战略”(strategies of displacement),并认为中国将分三个阶段依次推进该战略。中国只有首先钝化美国的胁迫、共识诱导与合法性三种能力(第一阶段),才能建立自己的制度并获得与美国相似的控制能力(第二阶段),然后在地区与全球范围扩张性地推行钝化战略和建制战略(第三阶段),最终取代美国的霸权地位。^③

除了首尾的引言(第1~2章)和结论,《持久战》一书中间的三个部分对应地分析了上述三个阶段。其中,第一部分(第3~6章)认为中国在“韬光养晦”(hiding ca-

①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② Rush Doshi, *The Long Game: China's Grand Strategy to Displace American Order*, pp.19~20, 300.

③ Rush Doshi, *The Long Game: China's Grand Strategy to Displace American Order*, pp.3~4, 20~24.

pabilities and biding time) 的总体原则下稳步推进第一阶段(1989~2008)的钝化战略。作者声称,中国在这一阶段的战略主要是静悄悄地采取不对称的方式,在亚洲地区削弱美国的军事、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第二部分(第7~10章)声称,“积极有所作为”(actively accomplish something)的战略判断使中国在2009~2016年期间转向致力于建立地区制度的第二阶段建制战略。第三部分(第11~13章)指出,中国自2017年提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great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至今,一直努力迈向第三阶段,即在全球层面同步推进钝化和建制的扩张战略。作者认为,中国制定“大战略”并从上述第一阶段战略转向第二、三阶段战略的关键,在于中国对中美实力差距和美国威胁的感知。^① 中国制定其“大战略”始于所谓的“创伤三部曲”(traumatic trifecta),即1989年“政治风波”、1990年海湾战争和1991年苏联解体。这三件接连发生的事件促使中国急剧地提升了对美国威胁的认知,从而致力于制定和推行试图钝化美国控制能力的第一阶段战略。至于中国在2008年和2017年分别转向第二阶段的建制战略和第三阶段的全球扩张战略的动因,则在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以及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及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等事件加速形成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些事件导致中国认为美国的实力在持续减弱,中国正在走向世界中心,中国外交随之采取了更加自信的应对战略。^② 在分析过程中,作者引用了大量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家领导人在不同场合的重要讲话、文字记录等具有战略重要性的文本,以论证其关于中国在三个阶段采取不同战略的判断。例如,作者认为,中国领导人在第一阶段战略时期频繁且明确地提及“国际力量对比”“多极化”等概念,以使中国外交战略符合该阶段“韬光养晦”的钝化战略;中国领导人在第二阶段战略时期也经常使用这些概念,但官方话语开始转向“积极有所作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则是中国在第三阶段战略时期的主要官方词汇,用以呼应该阶段中国的扩张战略。除了引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文本,《持久战》还分析了各个阶段中国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三个层面的战略行为,进一步强化作者有关中国取代美国霸权地位的观点。

最后,《持久战》提出了美国应对中国“大战略”的战略框架。作者认为,美国战略界有关对华战略的两大既有框架——通过所谓“大交易”(grand bargain)顺应中国或通过“合作螺旋”(cooperation spirals)“安抚”中国,以及通过“和平演变”或“颠覆政权”来改变中国——都面临重大障碍,因而是无效的应对之策。^③ 在作者看来,“最

① Rush Doshi, *The Long Game: China's Grand Strategy to Displace American Order*, pp.4, 16~19.

② 对三阶段中国战略转向的具体分析,分别参见 Rush Doshi, *The Long Game: China's Grand Strategy to Displace American Order*, pp.47~156, 159~258, 261~296。

③ Rush Doshi, *The Long Game: China's Grand Strategy to Displace American Order*, pp.298, 303~313.

符合逻辑”的战略是与中国围绕“控制形式”与能力展开激烈竞争,其实质“主要围绕谁将领导地区与全球秩序,以及它们可能在这个领导地位上创造何种秩序”。作者强调,竞争关乎中美“在(国际)等级体系中的角色”与地位,因此在很多领域都是“一场零和博弈”。但作者同时也承认,两国“可能存在相互调节的空间,特别是可以在由相互调节而产生的秩序和跨国议题方面开展合作”。^① 鉴于中国巨大的相对规模,美国不能和中国进行“美元对美元、舰对舰或贷款对贷款”(dollar-for-dollar, ship-for-ship, or loan-for-loan)的对称竞争,而应该发挥其优势(如吸引资源与人才的制度、联盟网络、远离敌对大国的地理距离等)进行成本效益最大化的竞争。竞争战略并非聚焦于内部变革或安抚,而是寻求限制中国运用其实力建立新的地区与全球秩序。为此,美国需要借鉴中国经验制定一个非对称竞争战略(asymmetric strategy for competition)框架。该框架由钝化战略和建制战略构成,前者主张美国应以低于中国建立其实力与影响力的成本去挫败中国的实力与影响力,后者指涉美国加大投资力度以巩固美国霸权秩序的基础。^②

二 《持久战》产生的多重影响及原因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英国外交家艾尔·克劳(Eyre Crowe)为了警醒时人关注德国的扩张主义战略,鼓吹强化英法同盟携手共抗德国,曾经四处奔走。在《持久战》一书中,杜如松自比克劳,并将一百多年前的德国比作如今的中国,告诫美国战略界在争论中国有无“大战略”的问题上,应当像克劳坚信德国具有取代英国霸权的“大战略”那样,“谨慎对待”中国想取代美国霸权秩序的“大战略”。^③ 运用所谓的“以社会科学为基础的更严谨和可证伪的方法”,^④杜如松将《持久战》打造成第一本由民主党政治精英提出并系统论证“中国取代美国霸权秩序”这一争议性观点的著作。该书自出版以来,在美国、加拿大以及欧洲等国家和地区引发关注,并被列入2022年度“莱昂内尔·吉尔伯奖”(Lionel Gelber Prize)候选名单。值得注意的是,该书对美国政府和其他各界已经产生重要影响,为中美关系发展、地区稳定乃至国际秩序走向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

首先,《持久战》对民主党政治精英影响巨大,拜登行政当局发布的诸多战略文件中都可找到其“影子”。早在2020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间,拜登就声称“中国正

① Rush Doshi, *The Long Game: China's Grand Strategy to Displace American Order*, pp.299~300.

② Rush Doshi, *The Long Game: China's Grand Strategy to Displace American Order*, pp.297~299, 313~329.

③ Rush Doshi, *The Long Game: China's Grand Strategy to Displace American Order*, pp.9~10.

④ Rush Doshi, *The Long Game: China's Grand Strategy to Displace American Order*, p.16.

在……打这场持久战”，认为“应对(中国)这一挑战者最有效的方法是建立美国盟友与伙伴的统一战线”，加大国内研发与投资力度，同时强调在与美国“利益相一致的议题上寻求与中国的合作”。^① 入主白宫之后，拜登的确按照上述计划推动对华政策。在2022年2月发布的《美国印太战略》(Indo-Pacific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报告中，拜登当局声称为了应对中国在印太地区谋求建立“势力范围”以及与中国展开战略竞争，美国正在为加强其国内实力进行基础性投资，同时与盟友和伙伴国家采取一致的对华政策举措，强化以共同价值观为基础的国际体系。报告强调，美国的政策目标不在于改变中国，而是致力于塑造中国的战略环境，以便在世界上建立最有利于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的“势力平衡”(balance of influence)。为了管控与中国的竞争，美国将与其盟友、伙伴与中国在气候变化、防止核扩散等领域展开合作。^② 一位匿名白宫高官在介绍上述报告的背景时表示，“我们认识到我们改变中国的能力有限，因此寻求通过建立一种推动我们所寻求的未来的势力平衡来塑造中国周围的战略环境，同时钝化北京为实现挫败美国和我们的伙伴的目标而付出的努力。”^③可见，《持久战》中的对华战略框架及其诸多主张已被拜登行政当局采纳，成为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重要内容。

其次，《持久战》有关中国大战略的核心论点也得到了共和党精英的认可。共和党在对华政策上往往比民主党更强硬，杜如松在《持久战》一书中有关美国强硬回击中国“大战略”的政策建议自然得到越来越多共和党精英的认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数曾任特朗普总统副国家安全顾问、现任保守派智库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杰出访问研究员的博明(Matt Pottinger)。2021年6月，博明在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就美中战略竞争做证时引用《持久战》的核心主张，声称美中敌对关系肇始于30年前冷战的结束，因为当时中国根据国际格局的变化调整了其“大战略”目标，目的是削弱美国的影响力，从而取代和主导美国打造的全球秩序。对此，他一方面批评西方“自由世界对此反应迟钝”，另一方面又称赞特朗普与拜登当局强硬应对中国“大战略”的“正确”之举。除了在信息、金融和高科技领域对华采取竞争性政策之外，博明还强调美国国会和国防部应加紧投入更多资金，以防止中国大

① Joseph R. Biden, Jr., “Why America Must Lead Again: Rescuing U.S. Foreign Policy after Trump,” *Foreign Affairs*, Vol.99, No.2 (March/April 2020), pp.64~76.

② The White House, *Indo-Pacific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The White House, February 2022), pp.5~6.

③ “Background Press Call by Senior Administration Officials Previewing the U.S.’s Indo-Pacific Strategy,” The White House, February 11, 2022, available at: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2/11/background-press-call-by-senior-administration-officials-previewing-the-u-s-s-indo-pacific-strategy/>.

陆“胁迫”甚至统一台湾地区。^① 从上述证词可以看出,博明几乎全盘接受了杜如松的对华政策分析。值得注意的是,博明发表上述证词时,《持久战》一书尚未正式出版,可见该书对博明等共和党精英的影响之深。

《持久战》也成为美国政策研究界、学术界、媒体界等热议的话题。总体而言,美国多家智库的政策专家和高校学者都肯定《持久战》的价值,^②有的甚至称赞该书“填补了美国对中国战略认知的核心空白”,^③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将“继续作为任何语言中所能找到的对中国 21 世纪初期大战略最彻底的剖析”。^④ 美国媒体大多以赞许的态度推荐《持久战》,认为该书呈现了杜如松的“严谨的思维”,拜登总统拥有这样一位“睿智的政策专家”是很幸运的。^⑤ 该书也引起了美国以外其他国家相关人士的关注和讨论。^⑥

《持久战》之所以能够引发如此热烈的讨论并产生广泛的影响,与几个因素密不可分。一是作者深得美国民主党建制派的重用和信任。杜如松是一位生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印度裔美国人,进入白宫之前担任自由派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中国战略倡议(Brookings China Strategy Initiative)创始主任,此前还曾在耶鲁大学蔡中曾中国中心(Paul Tsai China Center)、新美国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CNAS)等与民主党关系密切的高校与智库从事政策研究。这本厚达 400 页、脚注多

① Matt Pottinger, “Beijing’s Grand Strategy to Displace America,” Written Testimony Submitted to the U.S. Senat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 (Washington, D.C.: June 8, 2021), available at: https://www.hoover.org/sites/default/files/written_testimony_to_sasc1.pdf.

② Jerry D. Lenaburg, “The Long Game: China’s Grand Strategy to Displace American Order (Bridging the Gap),” *New York Journal of Books*, July 1, 2021, available at: <https://www.nyjournalofbooks.com/book-review/long-game-chinas-grand>; Andrew J. Nathan, “Two Books on Chinese Strategy,”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2021, available at: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reviews/capsule-review/2021-08-24/two-books-chinese-strategy>.

③ Charles Dunst, “A Review of Rush Doshi’s ‘The Long Game: China’s Grand Strategy to Displace American Order,’”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August 25, 2021, available at: <https://www.cfr.org/blog/review-rush-doshis-long-game-chinas-grand-strategy-displace-american-order>.

④ Andrew Scobell, “China and Grand Strategy: Does the Empire Have a Plan? A Review Essay,”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137, No.1 (Spring 2022), p.160.

⑤ David Wilezol, “‘The Long Game’ Review: Asia First, Then the World,”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ugust 9, 2021, available at: <https://www.wsj.com/articles/the-long-game-review-asia-first-then-the-world-11628547372>.

⑥ Colin Robertson, “The Long Game: Inside China’s Plan for US Displacement and Domination,” *Policy*, August 1, 2021, available at: <https://www.policymagazine.ca/the-long-game-inside-chinas-plan-for-us-displacement-and-domination/>; James Kynge, “Taming the Wolf Warrior - China’s Rising Aggression,” *The Financial Times*, August 10, 2021, available at: <https://www.ft.com/content/1b9cba7e-4473-4b27-adb2-67ef63e02717>; Peter Mattis, “A Thorough Explanation of China’s Long-term Strategy,” *War on the Rocks*, August 17, 2021, available at: <https://warontherocks.com/2021/08/a-thorough-explanation-of-chinas-long-term-strategy/>.

达 1500 条、写作耗费 5 年之久的《持久战》是作者与民主党精英研究和交流的产物。^① 正如作者所指出的,他在写作《持久战》期间曾得到包括中国问题研究界在内的几乎所有美国战略界知名人士的指点与提携——包括小布什时期东亚与太平洋事务副助理国务卿柯庆生(Thomas J. Christensen)、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与国际事务教授范亚伦(Aaron Friedberg)、哈佛大学政府系教授江忆恩(Iain Johnston)、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讲座教授傅泰林(Taylor Fravel)、德国马歇尔基金会(German Marshall Fund of the United States)亚洲项目主任葛来仪(Bonnie Glaser),以及奥巴马政府时期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何瑞恩(Ryan Hass),耶鲁大学法学院讲席教授葛维宝(Paul Gewirtz),特朗普政府时期代理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董云裳(Susan Thornton),等等。^② 其中,杜如松的导师、现任拜登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对《持久战》的影响最为深刻,其影响“可以在这本书的每一页找到”。^③ 事实上,早在杜如松出版《持久战》之前,他就曾多次和民主党精英发表过书中类似的观点,认为来自中国的挑战有助于美国逆转其衰落的趋势,^④主张美国全面认识中国的外交行为并积极管控美中竞争,^⑤主张加强与美国盟友的关系,共同应对中国带来的挑战。^⑥ 如今杜如松官拜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处于对华政策制定的核心位置,民主党建制派对他的信任与倚重可见一斑。

二是《持久战》中的主要观点与政策主张契合美国政府竞争性的对华政策定位与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为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提供了某种“正当性”。在分别于 2022 年 2 月和 5 月发布的《美国印太战略》和《印太经济框架》(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报告中,拜登当局进一步在政治、军事、外交、经贸、价值观等层面继承和框定了特朗普时期的竞争性与部分对抗性对华政策,同时又在全球重大议题上保留了与中国携手合作的可能。^⑦ 这种将竞争、对抗与合作同步推进的政策思路,反映在

① 参见作者推特,网址: <https://twitter.com/rushdoshi/status/1413104360746364932>, July 8, 2021。

② Rush Doshi, *The Long Game: China's Grand Strategy to Displace American Order*, pp.ix~xii.

③ Rush Doshi, *The Long Game: China's Grand Strategy to Displace American Order*, p.xi.

④ Kurt M. Campbell and Rush Doshi, "The China Challenge Can Help America Avert Decline," *Foreign Affairs*, December 3, 2020, available at: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20-12-03/china-challenge-can-help-america-avert-decline>.

⑤ Rush Doshi, "Hu's to Blame for China's Foreign Assertiveness?"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January 22, 2019, available at: <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hu-to-blame-for-chinas-foreign-assertiveness/>.

⑥ Ely Ratner et al., *Rising to the China Challenge: Renewing American Competitiveness in the Indo-Pacific*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December 2019).

⑦ The White House, *Indo-Pacific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The White House, February 2022); The White House, "Statement on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for Prosperity," May 23, 2022, available at: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5/23/statement-on-indo-pacific-economic-framework-for-prosperity/>.

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 (Antony J. Blinken) 此前提出的对华政策“三分法”上,即“应该竞争时竞争、可以合作时合作、必须对抗时对抗”。^① 在拜登政府看来,这是美国与中国展开“没有灾难的竞争”的关键所在。^② 显然,拜登政府应对中国挑战的上述政策观点与举措,在《持久战》一书中得到了充分的阐述与论证。鉴于杜如松与民主党精英之间的密切关系,该书既呈现和反映了民主党多数精英的对华政策共识,又反过来巩固和强化了包括拜登政府高官在内的党内精英的对华政策思路。自奥巴马第一任期后期至今十多年以来,美国战略界围绕对华政策展开了持续而激烈的辩论,在中美关系的性质、中国外交行为的根源以及美国应对中国的举措等方面逐渐达成了共识。^③ 在这个层面上,《持久战》的确可被视为美国对华政策转向的标志性事件。

三是《持久战》在研究方法和文献引证等方面相对来说更加规范。作者在书中指出,既有的辩论中国“大战略”和美国对华政策的研究都不够严谨,相关文献猜测有余而严谨分析不足,多次强调并建议使用“更严谨和可证伪的方法”。^④ 基于这种考虑,作者按照公开和保密文本的权威性的强弱进行了分类,依次分为领导人讲话、对外战略与外交文件、党媒刊载评论、各部级和军事单位的文件及出版物、智库研究报告与学术评论分析,并采用文本分析法 (textual approach) 对上述文本进行研究。^⑤ 作者还在《持久战》附录部分,较为详细地解释了选取相关文献资料进行研究以及对权威性文本进行强弱排序的原因。这种“科学化”的方法论意识,是该书获得较多肯定的主要原因之一。与现有的美国大多数讨论中国“大战略”的著作相比,这本著作在研究方法 with 文献选择方面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最为规范的。不同于白邦瑞基于其在五角大楼工作期间了解的奇闻轶事整理而成的《百年马拉松》一书,《持久战》运用了更加规范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挖掘和引用了大量中国官方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党内的战略性文献。这使得该书既具有较为规范的学术意味,又兼有较强的政策意涵。杜如松也因此被认为是第一个采用“系统化的方法”研究中国“大战略”的人,而这或许是《持久战》最为重要的贡献之一。^⑥

① Antony J. Blinken, “A Foreign Policy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March 3, 2021, available at: <https://www.state.gov/a-foreign-policy-for-the-american-people/>.

② Kurt M. Campbell and Jake Sullivan, “Competition without Catastrophe: How America Can Both Challenge and Co-exist with China,” *Foreign Affairs*, Vol.98, No.5 (September/October 2019), pp.96~110.

③ Odd Arne Westad, “The U.S. Can’t Check China Alone: What the State Department Gets Wrong about Beijing,” *Foreign Affairs*, December 10, 2020, available at: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20-12-10/us-cant-check-china-alone>.

④ Rush Doshi, *The Long Game: China’s Grand Strategy to Displace American Order*, pp.10, 16.

⑤ Rush Doshi, *The Long Game: China’s Grand Strategy to Displace American Order*, pp.42~44.

⑥ Peter Mattis, “A Thorough Explanation of China’s Long-term Strategy,” *War on the Rocks*, August 17, 2021, available at: <https://warontherocks.com/2021/08/a-thorough-explanation-of-chinas-long-term-strategy/>.

三 对《持久战》的批判与纠正

显然,《持久战》已引起美国国内外各界的热议,尤其对美国政府处理对华政策影响深远。这势必对脆弱的中美关系发展构成新一轮强烈的负面冲击,不仅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设置更多障碍,而且将对地区和平与发展、全球秩序的稳定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带来更多不确定性。尽管《持久战》被认为是对《百年马拉松》的修正与超越,但该书充斥着浓厚的美国/西方中心主义(American/Western-centrism)倾向与冷战式的零和思维,并在逻辑、观点、概念和方法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的错漏。

首先,该书对相关理论的不当运用、对历史的简单类比以及对中国外交的错误解读,反映了作者浓厚的美国/西方中心主义倾向与冷战式的零和博弈思维定式。这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该书运用的相关理论存在明显的局限性。《持久战》一书将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的实力差距和霸权国对崛起国构成的威胁强弱作为构建中国“大战略”的理论框架,并基于此框架分析中国应对美国的战略,得出中国意图取代美国霸权的观点。由此可见,近年来广受国际关系学界关注的权力转移理论(power transition theory)对该书产生了深刻影响。然而,这个理论却存在诸多局限与不足之处。其中最主要的一点是,该理论的主要变量——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分配与国际和平——之间的关系不甚严密,从而使该理论最后沦为美国打压新兴崛起国家并进而维持其霸权地位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工具。^①另一主要缺陷在于,该理论假定所有崛起国都是试图改变既有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国家”,而赋予守成国以维护秩序稳定的正面角色。但是,事实却并非如此。至少,近年来美国和部分西方国家因对全球化愤愤不平而加大力度推动“去全球化”的事实,表明美国才是修正主义国家。^②

其二,该书对历史过度简化并进行错误类比。《持久战》将中国比喻成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和20世纪逐步谋求霸权地位的美国,声称中国钝化美国影响力的做法与德国和美国谋取霸权地位的方式“如出一辙”。显然,将今日中国比喻成当年的崛起国德国和霸权国美国,不仅有过度简化历史之嫌,而且纯属错误类比。正如美国知名智库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高级研究员、曾任里根总统特别助理的道格·班

① 朱锋:《“权力转移”理论:霸权性现实主义?》,载《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3期,第24~42页。

② Steve Chan, “Challenging the Liberal Order: The US Hegemon as a Revisionist Power,”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7, No.5 (2021), pp.1335~1352.

多(Doug Bandow)尖锐地指出的,不同于曾经为争夺领土而与英国、墨西哥等国家发生战争的美国,中国并非“亚洲的美国”。^①《持久战》对历史的极度简化和错误类比,无助于把握真实的历史事件和复杂的国际政治现象及其实质,而且可能制造对华敌意与恐惧,将本已恶化紧张的中美关系推入冲突与对抗的泥潭,导致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所谓“大国政治悲剧”预言的自我实现。

其三,该书误解和误判了中国的外交行为。“中国外交的主要任务是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②随着中国的持续崛起和快速发展,美国及其西方盟友近年来以维护所谓自由、民主之名,加大力度干涉中国新疆、香港、台湾、南海等事务,损害中国的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并在经贸科技、人文交流等层面对中国进行无端的打压和遏制。为维护国家利益,中国采取了相应的反制行动。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反击外部势力损害其国家利益的意愿和能力也随之增强,这是近年来中国外交“变强”和走向“更强”的关键变量。^③然而,杜如松却将变迁中的中国外交行为和政策曲解为“修正主义”行为和“扩张性”政策,声称中国外交的终极目标是取代美国霸权。这显然是对中国外交的误读,映射出他狭隘的历史观与偏执的美国/西方中心主义倾向。不少深谙历史的西方国际关系学者批判了杜如松的上述论断。例如,美国知名冷战史学家、耶鲁大学历史学讲席教授文安立(Odd Arne Westad)指出,没有证据表明中国打算摧毁由西方国家设计和主导的国际体系。^④美国和平研究所(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USIP)杰出研究员施道安(Andrew Scobell)、俄亥俄州立大学政治系荣休教授约翰·穆勒(John Mueller)、昆西国家事务研究所(Quincy Institute for Responsible Statecraft, QIRS)政策分析家伊森·保罗(Ethan Paul)等学者则批评杜如松夸大了中国的战略能力与目标,认为所谓的“取代美国霸权秩序”之说无

① Doug Bandow, “The Ultimate Irony: Is China the ‘America’ of Asia?” *The National Interest*, May 27, 2015, available at: <https://www.cato.org/commentary/ultimate-irony-china-america-asia>.

② 《中国外交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官网,参见网页:<https://www.mfa.gov.cn/chn/pds/ziliao/tytj/t24782.htm>。

③ Yan Xuetong, “Becoming Strong: The New Chinese Foreign Policy,” *Foreign Affairs*, Vol.100, No.4 (July/August 2021), pp.40~47; Ryan Hass, *Stronger: Adapting America’s China Strategy in an Age of Competitive Interdependenc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21).

④ Niall Ferguson, “Most Threatening When Weak? The Risks China Poses to Global Security,”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July 2, 2021, available at: <https://www.the-tls.co.uk/articles/the-risks-china-poses-to-global-security-review-niall-ferguson/>.

异于制造一个强大的敌人。^① 因此,与其说《持久战》是对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大战略”的深入分析,倒不如说是作者深陷美国和西方霸权争夺与霸权护持的历史循环,在美国霸权的窠臼下臆想中国的外交战略。

事实上,有关中国“大战略”的研究始终是中国和国外战略界关注和研究的重要课题。中美学界不少人士认为中国具有某项“大战略”,有些学者甚至在中国“大战略”的目标方面达成一定的共识。例如,宾夕法尼亚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创始主任金俊远(Avery Goldstein)、施道安以及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胡鞍钢、同济大学特聘教授门洪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叶自成、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宋德星等美中学者都认为,中国“大战略”的目标是使中国成为世界大国,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之梦。^② 但是,他们对于中国实现上述“大战略”的途径存在较大分歧。中国学者倾向于基于对中国战略资源的评估,探讨中国实现“大战略”的可行性,主张采纳旨在避免盲目卷入国际权势争斗、专注于国家发展的内向型“战略现实主义”(strategic realism)政策,来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大战略”。大多美国学者则没有跳脱出芝加哥大学国际政治杰出讲席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的进攻性现实主义思维。^③ 他们迷信于西方近现代史上崛起国必然挑战霸权国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之说,侧重于运用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结果,来分析中国成为世界大国、实现民族复兴的战略手段,认为中国必将挑战并取代美国霸权并成为下一个“美国式霸权”国家。《持久战》实际上同样深陷于这种思维枷锁,声称中国的“大战略”就是希望效仿美国成为新的霸权国家,因而主张美国对华采取竞争与遏制战略。这种思路侧重于军事实力的物质(physical)含义,属于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理論范式。它显然误读了中国“大战略”的实现途径。正如韩国裔美国学者、南加州大学国际关系讲席教授康灿雄(David Kang)尖锐地指出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者忽视了对中国而言更为重要的思想和哲学等观念的含义,因而得出错误的“中国扩张

① John Mueller, “China: Rise or Demise?” *Policy Analysis*, No.917 (May 2021), pp.1~33; Ethan Paul, “What Biden’s Top China Theorist Gets Wrong,” *Lawfare*, October 7, 2021, available at: <https://www.lawfareblog.com/what-bidens-top-china-theorist-gets-wrong>; Andrew Scobell, “China and Grand Strategy: Does the Empire Have a Plan? A Review Essay,”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137, No.1 (Spring 2022), pp.155~160.

② Avery Goldstein, “China’s Grand Strategy under Xi Jinping: Reassurance, Reform, and Resistan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45, No.1 (Summer 2020), pp.164~201; Andrew Scobell et al., *China’s Grand Strategy: Trends, Trajectories, and Long-Term Competition* (Santa Monica, C.A.: RAND Corporation, 2020), p.18; 胡鞍钢、门洪华:《中美日俄印有形战略资源比较:兼论旨在“富民强国”的中国大战略》,载《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2期,第26~41页;叶自成:《中国迈向世界大国之路》,载《国际政治研究》,2003年第3期,第73~86页;宋德星:《战略现实主义:中国大战略的一种选择》,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9期,第4~17页;门洪华:《构建中国大战略的框架:国家实力、战略观念与国际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③ John J. Mearsheimer, “The Inevitable Rivalry: America, China, and the Tragedy of Great-Power Politics,” *Foreign Affairs*, Vol.100, No.6 (November/December 2021), pp.48~58.

论”。事实正好相反,中国在历史上和现实中更注重提升其吸引力和领导力,始终约束自己避免成为具有侵略性的“霸权”国家。^①一些中国学者提出的“战略现实主义”和“道义现实主义”(moral realism)^②等概念,正是对部分痴迷于“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美国学者的纠偏。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该书虽然分析了中国实现其“大战略”的能力,但并未深入剖析构建中国“大战略”硬实力基础的国家战略资源。总之,《持久战》对中国大战略的分析基于西方国家近现代以来的历史、理论与实践,缺乏对中国几千年来战略思想的动态分析和战略资源的综合评判。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该书对中国“大战略”尤其是中国实现其“大战略”的途径的分析,似乎更多的是基于美国霸权思维而想象出的结果。

其次,书中提出的诸多政策建议面临国内外多重挑战,其实际成效难免大打折扣。《持久战》多次强调美国应该借鉴中国的所谓钝化与建制战略,与其盟友协作对抗中国。但由于该书存在教条地套用相关理论、过于简化历史和现实、曲解中国外交行为等明显弊端,作者提出的对策难免面临一系列挑战而无法完全实现其政策预期。这些挑战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随着国家间经贸相互依赖不断加深、人文交流日益频繁、各国利益诉求多元化,美国不一定能全面动员北约、韩国、新加坡等盟友和伙伴参与其遏制中国的战略行动。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阎学通以及哈佛大学杰出服务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S. Nye)、柯庆生等中美学者从不同学理角度论证指出,与美苏关系截然不同的中美关系不大可能陷入所谓的“新冷战”,美国也难以迫使第三国在中美之间选边。^③以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为代表的政治领导人,也多次从政策层面表达了地区国家对中美冲突与对抗的警惕,以及在中美之间选边的难度和后果。^④不过,拜登主政之后,通过采取全面升级特朗普时期的“印太战略”、借助俄乌冲突捆绑式地夸大中俄“威胁”、推动美国对台政策的“多边化”等多个手段和举措,强化了

① Quincy Institute for Responsible Statecraft, “Debate: Should the U.S. Seek to Contain China?” December 16, 2021, available at: <https://quincyinst.org/event/debate-is-china-a-threat-to-the-u-s-that-needs-to-be-contained/>.

② 阎学通:《道义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载《国际问题研究》,2014年第5期,第102~128页。

③ Thomas J. Christensen, “There Will Not Be a New Cold War: The Limits of U.S.-China Competition,” *Foreign Affairs*, March 24, 2021, available at: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1-03-24/there-will-not-be-new-cold-war>; Joseph S. Nye, “There Is No Cold War with China,” *The New York Times*, Nov. 6, 2021, Section A, p.20; 阎学通、徐舟:《数字时代初期的中美竞争》,载《国际政治科学》,2021年第1期,第24~55页。

④ Lee Hsien Loong, “The Endangered Asian Century: America, China, and the Perils of Confrontation,” *Foreign Affairs*, Vol.99, No.4 (July/August 2020), pp.52~62.

与美国传统盟友及伙伴国家间的关系,对中国外交形成了全面的围堵与压制。^①然而,美国利用俄乌冲突和台海局势等议题强化与其盟友和伙伴的关系的政策到底效果如何,以及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仍有待观察。二是美国国内矛盾多发,使之难以贯彻一项旨在遏制中国的长期一致的战略。对于多数美国民众来说,有效遏制创下数十年来纪录的通胀率、解决因俄乌冲突而飙升的油价等国内问题才是当务之急。此外,政党分歧、种族冲突以及精英主义与民粹主义之间日益尖锐的对立,将刺激政治极化的美国进一步走向分裂,使美国国内在任何一项中长期政策议题上更难以达成共识。^②当然,美国遏制中国的战略还面临其他挑战,包括米尔斯海默近年来反复强调的挑战,即美国目前推行的自由主义霸权政策必将遭遇失败。^③

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国内外面临一系列政策挑战的背景下,美国战略界知名人士也开始反思和批判美国的霸权主义及其外交政策。例如,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指出,鉴于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以及中国和俄罗斯在不同领域对美国构成的“挑战”,美国应调整其外交政策并接受“势力范围”的回归,允许中俄两国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施加其影响力。^④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者史蒂芬·沃特海姆(Stephen Wertheim)也批评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将中国视为对手的霸权主义政策,认为美国才是寻求称霸世界、胁迫他国、藐视规则的国家,但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追求的军事霸权如今已不再可行。^⑤近年来中美两国对国际政治研究的趋势也表明,实现与中国的和解、合作与和平共处而非冲突与对抗,才是美国对华政策的起点与归宿。^⑥总之,《持久战》有关美国应对中国的政策建议,不可能在无视国内外政治现实与束缚的真空状态下自动产生政策后果。

再次,该书运用的研究方法 with 资料也存在瑕疵。作者声称试图以一种“独特的

① 赵善、李巍:《霸权护持:美国“印太”战略的升级》,载《东北亚论坛》,2022年第4期,第24~46页;赵明昊:《俄乌冲突对中美关系的影响论析》,载《和平与发展》,2022年第3期,第1~22页;周文星:《“印太战略”下美国涉台政策调整:战略清晰抑或战术清晰?》,载《闽台关系研究》,2022年第1期,第2~21页。

② 陈小鼎、李珊:《“穿着铠甲”的大国:美国公共政策的安全化》,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2年第8期,第55~82页;周琪:《政治极化正在溶蚀美国的民主》,载《美国研究》,2022年第2期,第9~34页;Daniel W. Drezner, Ronald R. Krebs, and Randall Schweller, “The End of Grand Strategy: America Must Think Small,” *Foreign Affairs*, Vol.99, No.3 (June/July 2020), pp.107~117。

③ John J. Mearsheimer, *The Great Delusion: Liberal Dreams and International Realitie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8)。

④ Graham Allison, “The New Spheres of Influence: Sharing the Globe with Other Great Powers,” *Foreign Affairs*, Vol.99, No.2 (March/April 2020), pp.30~40。

⑤ Stephen Wertheim, “The Price of Primacy: Why America Shouldn’t Dominate the World,” *Foreign Affairs*, Vol. 99, No.2 (March/April 2020), pp.19~29; Stephen Wertheim, “America Has No Reason to Be So Powerful,” *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6, 2020, available at: <https://www.nytimes.com/2020/10/15/opinion/america-global-power.html>。

⑥ 周文星:《中美战略竞争与国际政治研究转向的强化》,载《中国图书评论》,2021年第5期,第106~115页。

方法,系统而严谨地揭示中国的大战略”。^①的确,如前文所述,该书因其相对规范的研究方法而得到不少学者的肯定。作者所谓的“系统而严谨”的方法,指的是通过分析中国领导人的大量讲话和政府文件而得出一个结论,即冷战结束以来,从中国领导人提出“韬光养晦”到近年来提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始终推行一项旨在削弱美国实力并进而取代美国霸权的“大战略”。但问题是,作者所搜集的文献是否足以支撑他用于分析这期间中国所有的外交战略变化?作者自己也承认,“没有一份主要文件包含中国的所有大战略”。^②因此,作者不得不采用文献拼凑的折中方式,试图“还原”他眼中的中国“大战略”。曾任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麦艾文(Evan S. Medeiros)和何瑞恩等人曾指出,使用中共领导人讲话等相关资料分析中美关系辩论时更应保持谨慎的态度,因为研究者可能在“缺乏理解辩论本质的关键语境”的情况下,倾向于“选择性地运用文本支持其偏好的中国叙事”。^③《持久战》也概莫能外,文献资料的匮乏可能使该书在研究方法上难以避免陷入“选择性地运用文本”的困境。

最后,书中也存在不少概念误用之处。其中最为明显的一处是错误地翻译和过度解读“韬光养晦”的概念。作者不仅将该概念翻译为“隐藏能力,以待时机”(hide capabilities and bide time),而且认为它“发挥了一个大战略概念的作用,并使中国开始推行一个悄悄地和谨慎地钝化美国……的大战略”。^④对这个概念的误译,是美国政府、政策研究界与学术界最常犯的一个错误。^⑤究其原因,一是美国各界在客观层面上对中国历史缺乏深入与全面了解,二是主观意愿上倾向于在诸多翻译中采纳上述最具“攻击性”的版本,以便更好地匹配和实现其研究目的。这一用意与上文提及的“选择性地运用文本”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作者夸大这个概念的“战略性”含量,是为了服务于其构建“中国大战略”概念的需要。事实上,“韬光养晦”更多的是一种政策宣示,缺乏理论论证和可操作的路线图,因而并不具有“战略”的基本要素。^⑥作者对“韬光养晦”的翻译的“拿来主义”做法,与白邦瑞在其《百年马拉松》中对中国战

① Rush Doshi, *The Long Game: China's Grand Strategy to Displace American Order*, p.8.

② Rush Doshi, *The Long Game: China's Grand Strategy to Displace American Order*, p.3.

③ Richard C. Bush et al., "Where Brookings Experts Read about China,"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November 10, 2021, available at: https://www.brookings.edu/on-the-record/where-brookings-experts-read-about-china/?utm_campaign=John%20L.%20Thornton%20China%20Center&utm_medium=email&utm_content=189407346&utm_source=hs_email.

④ Rush Doshi, *The Long Game: China's Grand Strategy to Displace American Order*, pp.43, 48.

⑤ 熊光楷:《中文词汇“韬光养晦”翻译的外交战略意义》,载《公共外交季刊》,2010年夏季号,第55~59页。

⑥ 叶淑兰:《中国战略性外交话语建构刍议》,载《外交评论》,2012年第5期,第68~81页。

略文化的误译与误解并无二样,结果都给中美关系发展制造了“不当的敌意”。^①

除了上述问题,《持久战》一书还存在其他诸多错误与不足之处。例如,该书缺乏对美国对华政策行为的研究。要知道,美国对华政策往往可以形塑中国的对华政策及其“大战略”和实施行为。尽管这种肯尼斯·华尔兹(Kenneth Waltz)式的“简单即为美”(simplicity is beauty)^②的理论构建方式长期以来广受美国国际政治理论家的推崇,但这种对现实极度简化的学术分析方法显然无助于理解当今相互交织的国际关系,更无法解构复杂的中美关系。要全面理解中美关系并科学应对两国关系变化带来的潜在影响,就必须对两国的民族主义、经贸联系、媒体等国内因素进行更谨慎的考察,因为这些因素也是影响两国外交与对彼此的政策的重要变量。^③

结 语

得益于其相对规范的研究方法和对中国相关战略文献的旁征博引,以及作者身兼拜登政府要职等原因,《持久战》一书自出版以来引起了美国国内外各界的广泛关注。与《百年马拉松》一样,《持久战》也是近年来美国战略界对华政策辩论的产物。这两本著作分别呈现了共和党右翼势力和民主党主流政治精英的对华政策认知图景。随着特朗普在其任内将中美关系推入战略竞争与对抗的政策轨道,《百年马拉松》提出的“中国秘密取代美国霸权地位”的论断初步得到一些美国战略界人士的认同。拜登政府上台之后,迟迟未能根本性地扭转其前任的对华政策。《持久战》对《百年马拉松》的方法论修正以及对其核心论断的背书,似乎表明美国战略界的对华政策认知已跨越党派对立与左右分歧,逐渐呈现出某种罕见的对华政策共识。

《持久战》带有明显的美国/西方中心主义倾向和冷战思维,没有客观地呈现出美国对华政策应有的全貌。这些不足表明美国战略界的对华战略认知仍然存在明显的误解与误判,同时也反映了一个事实,即拜登行政当局缺乏真正懂中国的政策专家。这种现实情况深层次地反映了美国战略界的代际变化给中美关系带来的必然结

① 谢来辉:《制造敌意的翻译:以〈百年马拉松〉为例谈误译如何对国际关系产生负面影响》,载《国外理论动态》,2019年第3期,第118~127页。

②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Inc., 1979), p.39; Monica D. Toft, *Securing the Peace: The Durable Settlement of Civil War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p.xi.

③ 陈寒溪:《美国媒体如何“塑造”中国形象:以“中美撞机事件”为例》,载《国际新闻界》,2001年第3期,第5~12页;Randall Schweller, “Opposite but Compatible Nationalisms: A Neoclassical Realist Approach to the Future of US-China Relations,”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11, No.1 (Spring 2018), pp.23~48; Evan S. Medeiros, “The Changing Fundamentals of US-China Relations,”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42, No.3 (Fall 2019), pp.93~119。

果,对特朗普政府、拜登政府和未来的美国政府已经或将要造成深远影响。^① 美国对华政策建立在这种脆弱的认知根基之上,不仅让人怀疑其可操作性和可持续性,而且它可能对中美关系进一步造成的潜在危害令人担心。《持久战》并不表明美国对华政策已形成所谓的共识,更不意味着美国战略界关于“中国取代美国霸权”的争论可以盖棺定论了。近年来,多位美国知名学者和前政府高官围绕美国的对华政策展开激烈辩论,其中不乏对拜登当局的尖锐批评。^② 美国战略界多元的价值与利益之争使外界相信,美国各界在看待和处理美中关系的问题上难以达成完全一致的政策共识。

总而言之,《持久战》折射出了杜如松这一代美国政界人士的中国观,也呈现了越来越多美国战略界人士的对华政策认知。该书基于美国霸权主义的想象对中国“大战略”进行的分析和提出的应对之策,对中美关系发展、地区稳定乃至国际秩序走向都将造成不良后果。鉴于该书作者处于拜登当局对华政策决策核心圈以及该书在美国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应对其给予必要的关注和研究,以便更好地理解美国战略界的对华政策现状,把握、研判和应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及其未来走向。

周文星: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研究员、南京大学华智全球治理研究院
研究员

(本文责任编辑:罗伟清)

-
- ① Douglas H. Paal, "How U.S.-China Disputes on Trade, Taiwan,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Are Driven by Washington's New Generation,"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October 10, 2018, available at: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2018/10/10/how-u.s.-china-disputes-on-trade-taiwan-and-south-china-sea-are-driven-by-washington-s-new-generation-pub-77473>; William Overholt, "Biden Cannot Counter China with a Team That Lacks Expertise," *The Hill*, July 7, 2021, available at: <https://thehill.com/opinion/international/561269-biden-cannot-counter-china-with-a-team-that-lacks-expertise>.
- ② Joseph S. Nye, Jr.,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with China,"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43, No.1 (2020), pp.7~21; Fareed Zakaria, "The New China Scare: Why America Shouldn't Panic about Its Latest Challenger," *Foreign Affairs*, Vol.99, No.1 (January/February 2020), pp.52~69; G. John Ikenberry, Andrew J. Nathan, Susan Thornton, Sun Zhe, and John J. Mearsheimer, "A Rival of America's Making? The Debate over Washington's China Strategy,"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22, available at: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22-02-11/china-strategy-rival-americas-making>; David Barboza, "Ken Lieberthal on Washington's Major China Challenges," *The Wire China*, April 24, 2022, available at: <https://www.thewirechina.com/2022/04/24/ken-lieberthal-on-washingtons-major-china-challenges/>.

During the Ukrainian crisis,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disclosed continuously and timely declassified national intelligence on a large scale to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audiences. The U.S. national security institutions, the U.S. private sector, and the government and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of the U.S. allies are the important targets of this disclosure campaign.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has applied the “all government-all society” to organizing the public disclosure of intelligence, emphasizing cooperation and integration among all kinds of disclosing platforms and forging public networks centered on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In the Ukrainian crisis,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has practiced information warfare towards Russia characteristic of prebttal, which has been consolidated by public disclosure of intelligence, especially by the authority and timeliness of 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In such a campaign, national intelligence has become the source for the key themes and contents of the information warfare characteristic of prebttal, and the integrated, coordinated, and networked disclosing platforms have enhanced communications in terms of scope and speed, which has created beneficial conditions for effective sanctions and diplomacy.

China’s Grand Strategy Imagined by American Hegemony: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Long Game: China’s Grand Strategy to Displace American Order*

Zhou Wenxing (49)

The new book, *The Long Game: China’s Grand Strategy to Displace American Order* by Rush Doshi, Director for China on President Joe Biden’s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has attracted wide attention and generated heated discussion from all circles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the U.S. On the basis of America’s hegemonic imagination of China’s grand strategy, this book claims that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China has adopted a displacement strategy of blunting, building and global expansion in terms of military, politics and economy so as to achieve its long-term goal of the so-called displacement of the American hegemonic order. Judging from the trajectory of the U.S.’s China policy, especially that of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The Long Game* has already become a crucial “guide” for political elites of both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U.S. in formulating their China policy. Critically reviewing and particularly refuting the shortcomings and deficiencies of this book will not only help to understand the root causes of the current misguided U.S.’s China policy, but also contribute to grasping and analyzing the general outline and trend line of U.S.’s China policy in the future for a long time.

The Changes of American Youth’s Political Identity since 9/11: